



参加长征的甘肃临洮籍铁血男儿

□ 张晓东

甘肃临洮自古出英豪。红军长征过临洮时,革命队伍中就有不少洮河儿女的身影,他们是临洮县参加革命的先驱,是家乡人民的自豪和骄傲。这里我们选三位最具代表的临洮籍长征男儿,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以绘读者。

李彩云烈士

李彩云(1908—1937),临洮县洮阳镇人。1926年,在甘肃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在兰报名参军,入国民革命军军官骑兵团学习。参加北伐战争后,任排长、副连长,随部队编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931年12月,参加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在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第五军任团长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红四方面军从川西北入甘,9月李彩云驻渭源官堡(会川)时,任独立师师长,进军临洮,率部队伴攻临洮城,月余撤离。期间,他奉命在渭源、临洮等地开展创建苏维埃政权、扩红等工作。经过宣传动员,父送子、妻送夫踊跃参加红军,很快就有500多名新战士随李彩云辞别故乡,编入红五军,去会宁会师。红军在渭源官堡(会川)期间,李彩云还见到了他的姑母一家人,而在临洮县城内他的父母等亲人却未能见上一面,竟成永诀。

红军会师会宁后,同年10月下旬,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奉令由靖远渡河西征。西征途中,李彩云参加了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等地的血战。1937年春,西路军重新组建骑兵团,李彩云任红九军骑兵团参谋长,后率部分人马进祁连山打游击,决心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去延安找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年6月,因受错误路线的影响,被西路军内部高层领导人怀疑有叛逃可能,在永昌县东大河口南坝乡阎家墩村南面山坡上休息时,遭到秘密枪杀,年仅29岁。

李彩云是甘肃籍红军将士中的高级将领,也是党在

红军时期最早组建骑兵的高级指挥员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宗历史的冤案在征集西路军历史资料时被人们发现。李彩云亲属给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写信,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重视,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室、徐向前元帅办公室及伍修权、孙毅等老红军过问此事,李先念主席生前还专门作了批示。1992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7月,国家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李化民少将

李化民(1915—2002),临洮县洮阳镇卧龙人。他1928年参加国民党西北军;1931年12月在江西随26路军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

1933年,李化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班长、军部特务队警卫员、军宣传队分队长;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先后任少共国际师宣传队长、红一方面军宣传大队副大队长。到达陕北后,李化民任红一方面军回民支队代理政委、红十五军团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参加东征与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团通信参谋,豫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第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第一团营参谋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冀中军区第十六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奇袭阳明堡飞机场、反日寇“九路围攻”、保卫黄崖洞及豫北香城固、马子滩、林南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沈阳西区卫戍司令、辽西军区保安第一旅副旅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副军长,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平津、渡江、衡(阳)宝(庆)、广东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李化民任广州防空司令员。1954

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任某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78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任武汉军区顾问组长。

李化民将军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三大继续当选。先后荣获红军红星奖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章。2002年8月因病在武汉逝世。

张占彪大校

张占彪(1908—1972),临洮县衙下集镇中川村张家塬人。他1929年参加国民党军吉鸿昌部当兵;1931年12月参加江西宁都起义,随后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十三师三十七团。

张占彪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排长等职,参加了攻打赣州、发兵水口的战役和著名的黄陂伏击战;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重机枪连连长。红军长征过临洮时,他只能站在南乡的岚观坪上,望着洮河对岸清晰可见的故乡村子张家塬,思念着那里一河之隔的亲人们。

1937年,张占彪随西路军在参加了山丹、高台激战后被俘。关押他的国民党军营长系临洮人,以同乡关系资助费并偷放了他。释放后,他先躲在当地一户老乡家的地窖里养伤两个月,后历尽艰难万险,只身赴新疆找到队伍。1940年,他在陕北炮校学习,结业后,在高炮营任连长;1945年任高炮营营长;1948年在第一野战军任高炮团团长,参加解放大西北战役。

兰州解放后,张占彪随解放军进军新疆。1951年,他返回兰州,在三爱堂职工扫盲学校任教导主任;1954年调陕西安康军分区任司令员兼地委书记;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兼政委。1972年1月因病逝世。



南梁红色故事

「娃娃主席」

□ 杨维军

一到南梁,习仲勋就投身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南梁堡马大爷家,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了两天。习仲勋、张策等以工农兵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并主持会议,到会的100多名代表对即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置、人选提名推荐、基层政权建设等事项,进行了酝酿讨论。

1934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二),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选举大会,恢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土地委员长为张步清,劳动委员长为张钦贤,财政委员长为杨玉亭,粮食委员长为呼志录,肃反委员长为贾生秀,军事委员长为边金山。同时,还成立了保卫大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最初酝酿革命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征求师党委和各方面意见,大家一致推举刘志丹担任主席。而刘志丹坚持推荐习仲勋担任主席,并耐心地给大家做工作,他说:“做地方和群众工作,我不如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要出一个布告,习仲勋说用刘志丹的名义,刘志丹说:“用习仲勋的名义。”习仲勋说:“我没有影响,没有力量。”刘志丹说:“我们自己要扩大革命委员会的影响。革命委员会要在人民中建立威信。”当时,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还不满21周岁,年纪轻但老练稳重,能广泛密切地团结同志和联系群众,因此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娃娃主席”。据张钦贤的回忆,“筹备南梁政府的工作主要是仲勋主席负责的。他平时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说到就要做到,从不含糊。我们都很尊重他,老百姓也喜欢他”。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领导着以南梁为中心的各级红色政权,并指导陕甘边区十几个县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从此,年轻的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走到了独当一面的最前列。

习仲勋没有一点架子,和人见面说上三两句就很快赢得好感和信赖。他记性好,有人和他见一回,就记下名字。群众有困难都找他,有些老太太找他谈家务事,尽管有些啰嗦,但他都耐心听。红军扩红吸收新入伍战士,他亲自带领群众敲锣打鼓欢送。他工作起早贪黑,经常是一天走几十里山路。为了办学,他到处找老师、筹集资金和纸墨等。而且他凡是做一件事,办不成从不罢休。一次,他发现游击队抬伤员用门板做的担架,又笨重又不平,于是,他和同志们到山上砍下小树杆做杠子,用绳子网起来,上面铺上被子又轻又软,伤员躺下舒服多了。他处处关心人,快到冬天了还穿着单衣,同桂荣看到后连夜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他讲话,老百姓一听就懂。一次,给游击队员讲游击战术,他形象地比喻说:“绳子从细处断,打敌人就要打他的薄弱处。”

得民心者得天下。习仲勋的品德、作风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普遍爱戴。刘志丹称赞他:“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在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华池县境内建立了庆北办事处和赤安县革命委员会,在洛河川以南的几条大川里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同时,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第二路游击区不断发展,第三路游击区初步建立,逐步恢复了照金苏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充分展示了“娃娃主席”习仲勋在政权工作、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中的卓越领导才能。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下)

陇上胜境

丝路明珠——焉支山

□ 张天雁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一首著名的北朝匈奴民歌。民歌中的焉支山,是一座历史名山,位于山丹县东南6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历来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自古就有“走廊蜂腰”“甘凉咽喉”之称。

焉支山,又称胭脂山、燕支山、删丹山、大黄山、青松山等。“焉支”一词源于匈奴语,意为“天后”,是相对于祁连山(祁连山匈奴语,意为“天山”)。胭脂山、燕支山是匈奴语“阏氏”汉译的谐音;删丹山,据旧《山丹县志》载,“以晓日出映,丹碧相间如‘删’字,又名删丹山”;大黄山,因山间盛产药材大黄而得名;青松山,据《永昌县志》载,“大黄山又名青松山,向多松,今樵采殆尽……”故名。

历史上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诸多少数民族等与焉支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古老的游牧民族氏、羌、月氏、匈奴等在此繁衍生息;西汉初期,这里曾是匈奴昆邪王的重要牧地和避暑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与匈奴战,斩首八千余级;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登焉支山,会见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吐屯设等西域27国王公使,举办了多国博览会,有“世博圣地、世博故里”之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时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奉旨建宁济公祠(后称钟山寺),并由杨炎作《大唐燕支山宁济公祠堂碑》,以示纪念;1936年,红西路军曾在焉支山与国民党马步芳部浴血奋战,失利后,政委陈昌浩在此养伤,后辗转复返延安,红西路军在焉支山留下了战斗遗址。

焉支山自古就是水草丰美的天然优良牧场,自汉朝以来为历代官马场,当时匈奴等少数民族在此经营放牧;晋朝以后,焉支山以南的大马营滩,祁连山北麓的大河坝滩,一直为官马牧场;隋炀帝时,在此置官营牧场,育官马10万余匹;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是官马饲养的重要地区之一;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甘肃设行太仆寺,焉支山也是官方牧马的重要场所。

焉支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吟咏的诗词。唐代李白有“虽居焉支山,不道朔雪寒。”岑参有“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韦应物有“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李昂有“汉家未得燕支山,征戌年年沙朔间。”王维则有《燕支行》诗;明末吕大器有“瀚海欲空青见月,焉支未染白如琼”等描写焉支山的壮美诗句,也成为边塞诗人笔下抒豪情的代名词。

焉支山风光秀丽,景色怡人。山峰拔地而起,悬崖峭壁直插云霄,岩如斧削,壁如林立,重峦叠嶂;四周山壁纵横,怪石嶙峋,松柏苍翠,碧绿欲滴,山涧溪流潺潺,如鸣环佩;崖峰谷底绿树藤蔓,参差披拂,草木葱茏,蜂飞蝶舞,鸟语花香,“删丹朝晖”为山丹十景之一。山上有钟山寺、玉皇观、大佛殿等名胜古迹,是消夏避暑、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焉支山,既是一座历史名山,又是一座文化名山,承载着几千年的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新时代,更应抒写保护开发的新篇章。



珍赏

清粉青釉蟋蟀罐

□ 胡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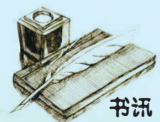
我收藏有几十个蟋蟀罐、罐。有晚清的用粗竹段制作的蟋蟀笼,笼上装有提梁,中间有开槽,安置一竹门,门中开挖了细细的木栅栏。放在桌上,形如手炉;有北方制罐名家郭景升制作的晚秋罐,盆壁较厚,硬度和密度较高,保湿度好;有用葫芦制作的篁笋纹蟋蟀罐,造型美观,罐壁柔软,封闭性好,既保暖又轻巧。

在众多藏品中,有一件清乾隆的粉青釉莲瓣纹蟋蟀罐(如图)。罐呈鼓状,通体施天青色釉。有盖,盖为平盖,与罐身子母扣合。盖内有一圈回纹,盖中心有一小透气孔。罐身上端有一圈如意纹,下端饰有两层部分重叠的莲瓣纹,中间没有其它的纹饰。罐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此罐造型隽雅秀美,胎质坚实细密,釉色莹润淡雅,工艺精细,纹饰简洁,看上去既温润如玉,又蕴含着内敛的气质,让人爱不释手。

蟋蟀,俗称蛐蛐,促织,趋织,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诗经》中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齐白石曾绘画一幅《出居声响》,一只刚从瓶子里爬出来

的蟋蟀,纤毫毕现,栩栩如生。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的《促织》,讲述的是因皇室爱好斗蟋蟀而给百姓带来的灭顶之灾的故事。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斗蛐蛐”,是我国民间的一种博戏。豢养、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伴随着斗养蟋蟀之风,虫具的设计制作亦不断地推陈出新。其材质有瓷、陶、玉、石、角、以及象牙、漆器。器型有圆罐、方罐、六角罐、八角罐、竹节罐、南瓜形罐、塔形罐。最早的蟋蟀罐都是由帝王指定的御窑和官窑烧制的,作为贡品专供皇室使用,极少传至民间。

历史上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酷爱斗蟋蟀,也曾敕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了大量工艺精良、纹饰新颖多样的蟋蟀罐。1993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时,出土了大量的碎瓷片,并将部分碎瓷片拼凑出一批蟋蟀罐。这些器物都是以前未曾见过的官窑制品。这与宣德帝卒后,按照太皇太后命令将御窑厂烧制而尚未进贡的蟋蟀罐打碎深埋于地下的文献记载相合。



书讯

近日,由永昌县委编办的《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出版。该辑文史资料共收录文章57篇,22万多字,从历史文化、考古文物、文学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史与西路军5个专题,多角度展示永昌历史文化变迁的硕果,讴歌了永昌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永昌文史资料选辑》出版

该辑文史资料收录的文稿,或以史料性见长,或以趣味性取胜;或叙写历史陈迹,或描摹风情民俗;或见景生情,或睹物思人,文笔朴实无华,有较强的资料性、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史料佳作。

(胡彦斌)